

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一版本之比對研究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助理教授
吳國聖*

摘 要

筆者對照現藏京都大學的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與現藏俄羅斯科學院聖彼得堡分院東方學研究所的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之經文，確定兩者屬於不同的版本，文字上有所差異，推測其中一方應經過修訂。其版本之先後，以及何者曾經釐定，可從夏、漢經文對應的密切程度加以判斷。藉由分析修正前後的語句差異，得以觀察西夏譯場翻譯經典之過程，以及西夏人對西夏語佛經譯文的正誤判斷。這些珍貴的新、舊版本對應，能增進吾人對西夏語文文獻的理解，並且可以評估不同時期的西夏譯者對漢文《大方廣佛華嚴經》的認識程度。本文以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一為實際案例，討論西夏譯經與後續修訂的版本差異，以及不同時期西夏譯文之演變。

關鍵詞：華嚴經、西夏語文、翻譯、版本學、譯場

*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西夏語文獻《擇要常傳同名雜字》之研究」（計畫編號：NSTC112-2410-H-007-022-MY2）成果之一，特此申謝。

一、研究緣起

佛典之漢譯，由來已久。從漢代以降，歷南北朝、隋唐，乃至北宋時的譯經院，甚至其後的元、明、清代，均有規模不一的譯經活動。其中以「譯場」等集體譯經組織或機構對後世佛法之傳承、經典之廣布，影響最為宏大。集體從事譯經時，參與成員各有分工，如口授、筆錄，或轉譯、審校，各有司職之人。西晉竺法護譯經時，已粗具分工合譯制度，再經前秦道安、姚秦鳩摩羅什等人逐步發展，成立了譯場制度。其後佛經譯場之規模漸次擴大，參與人眾亦有所增加。¹

歷代佛經譯場的漢文譯作，種目相當豐富。以今日流通最廣的《大正新修大藏經》為例，其中多數經典均由鳩摩羅什以降之歷代譯場所譯出。然而，保留至今的佛經文本，多為最終定稿、入藏之版本，尚未見過譯場翻譯過程產生的譯稿或工作本。而歷代譯場本身的檔案、文獻也幾乎沒有保留下來。吾人只能從佛典譯本前後的署名或題記，推測譯者的組成以及譯文的編輯步驟。目前學界對歷代譯場的翻譯過程與細節，以及佛典譯文之先後歷史版本，瞭解都非常有限。²

西夏國從統治者到人民，上下篤信佛教，從開國之君元昊統治時期（公元1032-1048年）即有將佛典譯為西夏文本之記載。³夏譯佛經多由官方組織人手從事，西夏譯場與北宋譯場制度似有相似之處。⁴然而，西夏譯場卻有唐、宋中原譯場均罕見的圖像記錄：在部分西夏佛典卷首，竟有木刻版畫描繪譯場的翻譯實況，具體而微地呈現當時譯經之分工與格局。⁵不僅如此，還有一些夏譯佛經留下了「初譯本」及其「校譯本」，讓我們得以依據不同版本，觀察西夏譯場譯經之過程，且能從譯本間的差異，判斷其翻譯方法與原則為何，進而評估其成果。

¹ 關於歷代佛經「譯場」，因存世資料有限，不易深入分析，研究上有很大的侷限。學界對譯場的普遍理解參見曹仕邦，〈中國佛教的譯場組織與沙門的外學修——大乘佛教奠基於東亞的兩大要素〉，《中華佛學學報》第12期（1999年7月），頁113-131。徐天池，〈論佛經翻譯的譯場〉，《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頁91-95。閔艷，〈佛經翻譯的譯場及翻譯程序〉，《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頁29-35。李平艷，〈論隋唐時期譯場和佛經翻譯〉，《蘭州教育學院學報》2019年第5期，頁162-163、168。

² 以河西走廊地帶為例，與其地譯場相關之研究仍相當有限。該地區所譯佛典中，存在不同版本得以對勘者也甚少。見王作偉，〈歷代河西走廊譯史資料研究的現狀與展望〉，《語言與翻譯》2021年第2期，頁59。

³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67-79。

⁴ 崔紅芬，《西夏河西佛教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頁184-193。段岩、彭向前，〈《西夏譯場圖》人物分工考〉，《寧夏社會科學》2015年第4期，頁132-136。

⁵ 史金波，〈《西夏譯經圖》解〉，《文獻》1979年第1期，頁215-229。段岩、彭向前，〈《西夏譯場圖》人物分工考〉，頁132-136。陳永耘，〈一幅珍貴的版畫——《西夏譯經圖》〉，《東方博物》2010年第2期，頁111-113。曾發茂、于光建，〈《西夏譯經圖》版畫的藝術特征分析〉，《美術大觀》2020年第1期，頁86-87。

現存西夏文佛典，最早出自西夏惠宗朝（1068-1086）及崇宗朝（1086-1139）。仁宗當政（1139-1193）時開始對前代譯經展開校對。在黑水城等地出土之西夏文佛典中，部份經典有新、舊譯本倖存於世，⁶可以觀察不同時期譯文的差異，分析譯場修訂譯文處，知道哪些譯文內容是需要被「修正」的。

關於西夏文佛經新、舊譯本間之異同，過去已有研究涉及。如西田龍雄提到《法華經》相異版本間的比較；⁷孫伯君、聶鴻音等整理部分新、舊譯差異之案例；⁸吳國聖也曾提出西夏文《華嚴經》新、舊譯文差異之研究。⁹在這些具有新、舊版本的西夏語譯佛經中，以《大方廣佛華嚴經》篇幅最大，¹⁰但對該經之版本差異，迄今研究相當有限。以研究西夏文《華嚴經》成果最多的西田龍雄教授為例，他雖然曾在著作中分析過京都大學藏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的版本，但當時俄藏本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尚未整理公開，故無法運用俄藏本進行比對，僅討論了京大藏本（共11卷，為同一版本）的內部文字差異，其研究均未能參照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初譯本進行比對。¹¹

筆者持續研究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詳細對照了京都大學藏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西夏仁宗朝校譯本）與現藏俄羅斯科學院聖彼得堡分院東方學研究所的黑水城出土《大方廣佛華嚴經》（西夏惠宗朝初譯本），確認兩者屬於不同的版本，在文字以及譯法上有為數龐大的差異之處。相較於俄藏本，京大本與漢文底本更為貼合，可以推測其應經過修訂，應為仁宗時代校譯本。¹²

在先前的研究中，我曾討論過一則珍貴的案例，發現《華嚴經》惠宗朝初譯本中有一處誤譯，該處誤譯在其後的仁宗朝校譯本中獲得修正。一般情況下，經過校譯的版本應該較為正確，但在此個案中，已校譯的文本卻又出現了新的錯字——表示譯場中的「譯者」與「筆受」很可能是不同的兩（批）人，以致在「譯者口述」到「筆受記錄」的過程中出現了錯誤。不僅如此，直至西夏譯場完成該譯本，印刷成冊並且公開之後，這些明顯的錯誤卻仍然沒有被發現，繼

⁶ 相關的經典及其新舊版本，參見孫伯君，〈西夏仁宗皇帝的校經實踐〉，《寧夏社會科學》2013年第4期，頁89-98。孫穎新，《西夏文《大寶積經·無量壽如來會》對勘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頁9-11。

⁷ 西田龍雄著，西田龍雄博士論集刊行委員會編，《西夏語研究新論》（京都：松香堂，2012年），頁307-321。

⁸ 孫伯君，〈西夏仁宗皇帝的校經實踐〉，頁89-98。聶鴻音、張吉強，〈西夏佛經校譯所見的語音信息〉，《華西語文學刊》2016年第2期，頁154-157、403-404。

⁹ 吳國聖，〈西夏文華嚴經中的「孝」：基於梵、藏、漢、西夏文本對勘之研究〉，《2018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臺北：華嚴蓮社，2019年），頁327-353。

¹⁰ 相關討論見吳國聖，〈西夏文《華嚴經·十地品》「世間技藝」考〉，《2022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臺北：華嚴蓮社，2022年），頁195-207。

¹¹ 西田龍雄，《西夏文華嚴經》1（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1975年），頁4-8。

¹² 西夏文佛經校譯本的特徵之一，是讓西夏譯文的語句、用詞更接近漢文底本。

續保留在文本之中。¹³這或許反映了譯場的翻譯或校對品質方面有問題，可能是因為缺乏通曉漢、番雙語之人才，抑或編輯時間不足所致。西夏文《華嚴經》各章節譯文細節之正誤，值得深入探討。

經文之修訂與否，可從夏、漢經文之對應程度有無差異來加以判斷。從被修改的語句及修改前後的内容，也可窺見西夏譯場翻譯、修訂佛經的實際作法。這些珍貴的新、舊經文本差異，能增進吾人對於西夏語文的理解，並且據以觀察西夏譯者對漢文《大方廣佛華嚴經》的認識。唯前人研究中尚未就這些文字修訂進行研究，筆者認為有必要做一系列地毯式的通盤檢討。因此，本文以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一部分段落為案例，討論校譯修正處與版本之各種型態。

二、版本對勘與文本解析

為便對照先後版本差異，以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館藏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一（仁宗朝校譯本）為基本文本，¹⁴以俄藏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一（惠宗朝初譯本）為對校本。¹⁵

（一）經題

新、舊兩個版本的差異，在經題中已經出現。校譯本第一卷卷首，其經題書為「𪛗𪛘𪛙𪛚𪛛𪛜𪛝𪛞𪛟𪛠𪛡𪛢」：

𪛗	𪛘	𪛙	𪛚	𪛛	𪛜	𪛝	𪛞	𪛟	𪛠	𪛡	𪛢
ljij ²	tshja ²	wa ²	tha ¹	wja ¹	ljuu ²	lwər ²	rejr ²	lji ²	lew ¹	tsew ²	tsjij ²
大	方	廣	佛	花	嚴	經	卷	一	第	解	

初譯本則為「𪛗𪛘𪛙𪛚𪛛𪛜𪛝𪛞𪛟𪛠𪛡」。校譯本之「𪛚𪛛」二字，初譯本原作「𪛚𪛛」，且初譯本並無「𪛢」字：

𪛗	𪛘	𪛙	𪛚	𪛛	𪛜	𪛝	𪛞	𪛟	𪛠	𪛡
ljij ²	tshja ²	wa ²	wja ¹	tha ¹	ljuu ²	lwər ²	rejr ²	lji ²	lew ¹	tsew ²
大	方	廣	花	佛	嚴	經	卷	一	第	

¹³ 吳國聖，〈西夏文華嚴經中的「孝」：基於梵、藏、漢、西夏文本對勘之研究〉，頁327-353。

¹⁴ 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館藏《𪛗𪛘𪛙𪛚𪛛𪛜𪛝𪛞𪛟𪛠𪛡》，編號：CXIII|S|17|貴重。圖版見西田龍雄，《西夏文華嚴經》1，頁1-28。

¹⁵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藏黑水城文獻，編號 ИИВ.No.4271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一》。圖版見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藏黑水城文獻》2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112-115。

校譯本第五、第六兩行的修正互有關聯。首先，校譯本將位置格助詞「𠵼」(中、內、於)字從「𠵼」(國)字之後，往後移至「𠵼」(場)之後，並刪除初譯本的「𠵼」(中、間、內)字。表示在翻譯初譯本的當下，譯者係將華嚴經原文「佛在摩竭提國阿蘭若法菩提場中」點斷為「佛在摩竭提國 | (在)阿蘭若法菩提場中」，使得佛說法的地點被分解成前後兩段。

而校譯本在重新理解經義之後，視「摩竭提國」為較「阿蘭若法菩提場」範圍更大的地點，成為後者的定語，或認為後者從屬於前者，故將表示位置格的「𠵼」放在後者「菩提場」後，且把該處原有的「𠵼」(中)改為「𠵼」。即從初譯本之「摩竭提國—𠵼 | 阿蘭若法菩提場—𠵼」改譯為校譯本「摩竭提國—阿蘭若法菩提場—𠵼」，合併初譯本的兩段說法位置為一處。

(四) 行 7

校譯本作「𠵼𠵼𠵼𠵼𠵼𠵼𠵼𠵼𠵼𠵼」：

𠵼	𠵼	𠵼	𠵼	𠵼	𠵼
lji ¹	dziej ²	nioow ¹	·ji ¹	lji ¹	wja ¹
寶	輪	及	眾	寶	花、華

「寶輪，及眾寶華、」

𠵼	𠵼	𠵼	𠵼	𠵼	𠵼	𠵼
gji ¹	sej ¹	mo ²	džji ¹	ŋwu ²	ljuu ²	tja ¹
清	淨	[摩]	[尼]	以	端、好	裝飾

「清淨摩尼，以為嚴飾。」²¹

「清淨摩尼，以為嚴飾」一句，在西夏語的譯法是「清靜摩尼-𠵼(以)-嚴飾」(以清靜摩尼為嚴飾)，「𠵼」字在此有工具格的功能。而初譯本之「𠵼𠵼𠵼𠵼」(嚴飾)，在校譯本中被簡省、更改詞序為「𠵼𠵼」(嚴飾)二字。初譯本表示「嚴飾」之四字可分析如下：

𠵼	𠵼	𠵼	𠵼
tja ¹	wer ¹	ljuu ²	tshjij ²
飾	飾	端	嚴

²¹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2024.R2, T10, no. 279, p. 1b28。

查考其他西夏文獻，可知對應《華嚴經》漢文「嚴飾」之「𦉑𦉑𦉑𦉑」一詞，為「𦉑𦉑」(裝飾、服飾、彩繪)²²加上「𦉑𦉑」(莊嚴、壯麗)²³的複合詞。而校譯本之「𦉑𦉑」可能是由初譯本「𦉑𦉑𦉑𦉑」拆成前後「𦉑𦉑」、「𦉑𦉑」兩詞之後，取各詞之頭一字組成。筆者推測，初譯本之西夏譯者在翻譯漢文「嚴飾」時，因沒有現成可用的譯語，故使用「𦉑𦉑」加上「𦉑𦉑」迂迴地複合為「𦉑𦉑𦉑𦉑」，其「𦉑𦉑」與「𦉑𦉑」二詞應是當時西夏語已有用法或固有語詞，而校譯本則改以「𦉑𦉑」與「𦉑𦉑」新鑄出「𦉑𦉑」一詞(coinage)。初譯本翻譯時，似乎盡量用西夏固有語來翻譯，故同一語句在初譯本中，多半長度較長。而校譯本則盡可能以較少音節，甚至有以符合漢語音節數量之西夏語詞來翻譯漢文原文的傾向。「𦉑𦉑」一詞可能是校譯本「釐定」的西夏佛教名相之一。

(五) 行 8

校譯本作「𦉑𦉑𦉑𦉑𦉑𦉑²⁴𦉑𦉑𦉑𦉑𦉑𦉑²⁵𦉑²⁶𦉑𦉑𦉑²⁷」

𦉑	𦉑	𦉑	𦉑	𦉑	𦉑	𦉑	𦉑
bju ²	mji ¹	džu ¹	sjwi ¹	mo ²	dži ¹	džow ¹	we ²
邊	無	顯	現	[摩]	[尼]	幢	為

「無邊顯現；摩尼為幢，」

𦉑	𦉑	𦉑	𦉑	𦉑	𦉑	𦉑	𦉑
·ju ²	bji ¹	swew ¹	wja ²	·ju ²	thjoo ¹	yiē ²	to ²
常、恆	光	明	放	常、恆	妙	音	出

「常放光明，恆出妙音。」²⁸

漢文「摩尼為幢」一句中，校譯本刪除初譯本「𦉑𦉑」(摩尼)一詞後方之「𦉑」(以)，無論音節數或者用字都更貼近漢文。但初譯本因為添加了工具格助詞「𦉑」，該譯法對理解原文「摩尼」的格位(語法功能)則更為清楚，也更利於使用西夏語文的讀者閱讀佛經。

²² 韓小忙，《西夏文詞典(世俗文獻部分)》第7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頁345。在下文中，此書均簡稱為《西夏文詞典》。

²³ 韓小忙，《西夏文詞典》第5冊，頁85。

²⁴ 初譯本後面多「𦉑」。

²⁵ 初譯本此處無「𦉑」。

²⁶ 初譯本後面多「𦉑」。

²⁷ 初譯本無「𦉑」。

²⁸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2024.R2, T10, no. 279, p. 1b29-c1。

菴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war ²	ba ²	bji ¹	wejr ¹	tha ¹	pju ¹	ɣie ¹	bjū ¹
枝	葉	光	茂	佛	威	力	故

「枝葉光茂。佛神力故，」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thji ²	rej ²	lhjoor ¹	ljū ²	tshji ²	ɲowr ²	ɲowr ²	thja ²	kha ¹	rar ²	śja ²	phji ¹
此	道	場	端	嚴	一切	一切	彼	中	影	現	令

「令此道場一切莊嚴於中影現。」³⁶

此行「𦉳𦉳」(一切)之後，初譯本有「𦉳」字，對應漢語的「中」。但該西夏字筆畫扭曲，不易辨識。其左側部件「𦉳」在西夏文字多與「水」有關，但在此句中，無論作字形相近之「𦉳」[sjo²] (汗) 或「𦉳」[mə²] (泉) 字，均難以理解。筆者判斷該字應為指示代詞「𦉳」[thja¹] (其、此、斯)，且「𦉳」字後一字為「𦉳」，兩字連用之「𦉳𦉳」(其中)一詞曾見於西夏譯《類林》。³⁷經筆者以顯微鏡仔細檢查原文獻圖版中該字筆畫後，確認「𦉳」字為「𦉳」無誤。³⁸

校譯本則將「𦉳」[thja¹] 改為聲調不同的「𦉳」[thja²] (其) 字，與後方之「𦉳」[kha¹] (中) 合為一詞「𦉳𦉳」。該詞見於《孫子》、《貞觀政要》、《慈孝傳》等文獻，亦可表示「其中」之意。³⁹「𦉳𦉳」與「𦉳𦉳」兩者之差異尚待釐清。此處「𦉳」[thja¹]、「𦉳」[thja²] 意義相近，字形、部件相似，僅音調不同，兩字必有關聯。校譯時修正初譯本用字為其他「同音、不同調」西夏字的現象，與初譯時譯場傳譯、筆受時出現的誤聽、誤寫，或誤用語法用詞可能有關。

(八) 行 12

校譯本作「𦉳𦉳𦉳𦉳𦉳𦉳𦉳𦉳⁴⁰𦉳𦉳⁴¹𦉳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𦉳
thja ¹	po ¹	tji ¹	phu ²	so ²	dzju ¹	buu ²	lja ¹
其	[菩提]		樹	高	顯	勝	特

「其菩提樹高顯殊特」

³⁶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2024.R2, T10, no. 279, p. 1c3-4。

³⁷ 韓小忙，《西夏文詞典》第1冊，頁626-627。

³⁸ 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獻之圖錄，為節省印刷經費，將文本縮印至肉眼無法辨識的程度，必須以顯微鏡放大數百倍後，方可勉強閱讀。但因此種解析度已經接近平版印刷之網點能顯示的極限，筆畫或點畫很容易與網點或書頁上的灰塵相混淆，必須謹慎辨識。

³⁹ 韓小忙，《西夏文詞典》第3冊，頁694。

⁴⁰ 「𦉳𦉳」在初譯本中為「𦉳𦉳」，「𦉳𦉳」在初譯本中為「𦉳𦉳」。

⁴¹ 初譯本後面多一「𦉳」字。

概	𪗇	𪗈	𪗉	𪗊	𪗋	𪗌	𪗍
nioow ¹	mo ²	džji ¹	ŋwu ²	thja ²	·jij ¹	mjaa ¹	we ²
復	摩	尼	以	其	之	果	為

「復以摩尼，而為其果。」⁴³

初譯本「𪗊」[twu¹]（各），於校譯本中改譯為「𪗋」[djii¹]（分），兩者在發音或者字形上都不相同。筆者推測，初譯本翻譯時，原來可能要寫「𪗊」[džjow¹]（分）字，但不慎誤寫為字形甚為相近的「𪗊」（各）。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初譯本之「𪗌」[du¹]（置），後改譯為校譯本之「𪗍」[bio¹]（行）。在初譯本中可能打算譯為「𪗎」[khjii²]（行），但書寫成形似的誤字「𪗌」（置）。這兩處有問題的譯文，都在校譯本中被修正。然而，校譯者很可能因為無法理解為何初譯本會用音、義均不合的「𪗊」、「𪗌」二字來翻譯「分」、「行」，故直接依據漢文底本，挑選了適合的西夏語詞來重新翻譯。此一更動，凸顯了初譯本的翻譯問題，判斷應屬初譯本之筆受者在書寫時產生的筆誤，他的西夏文書寫可能並不熟練。但在初譯本編輯過程中，這些明顯的誤譯問題均未被校對出來，這是很值得吾人注意的現象。

三、結論

從前述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第一卷新、舊譯本間之部分差異案例，可具體瞭解仁宗朝時的校譯更改了哪些初譯本的語句、用詞，甚至是語法。既然譯文需要校改，表示在仁宗朝譯場看來，初譯譯文那些被修正的部分已經被視為不妥或不正確的用法。這是西夏文獻中極為少見，可以從文獻記載間的差異，確認古人對語言的主觀判斷，並透過這些改正，得知語文「正確程度」的寶貴例證。

從本文引用之西夏文例，可將這些校譯修正處，分為四種需要分析的現象：

1. 對底本的不同理解：如校譯本行 6 的不同譯法，背後其實是新、舊譯之間對漢文底本的點斷有所不同，反應出不同譯者對翻譯底本的不同解讀，也可理解為不同時期西夏人對佛學義理的認知差異。
2. 是否創造新詞：以行 7、行 12 為例，初譯本多運用固有西夏用詞，迂迴地轉譯漢文底本的用詞，而校譯本則基於漢文底本的逐字直譯或發明新鑄詞。兩者處理文本的方式有所不同，可推知初譯與校譯者很可能是不同的兩批人。

⁴³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2024.R2, T10, no. 279, p. 1c6-7。

惠宗與仁宗兩朝先後相差 50 至 120 餘年，對平均壽命可能不超過四十歲的西夏人而言，這段期間已經是好幾個世代，譯校者勢必有所不同。其間語言現象和語言規範也很可能有了變化。

3. 筆受者的誤聽：如行 10 新、舊譯本間語詞的順序不同，可能是在譯場中聽寫、筆錄時，書寫者把詞語的順序聽反了。⁴⁴而行 11 至 12 行則是將校譯本改寫為同音而不同調的另一語詞，有可能是書寫者誤聽口譯者的聲調所致。⁴⁵
4. 書寫者的誤寫、誤記，以及校對問題：如第 8 行中有未見於其他西夏文獻之文字，很可能是錯別字。顯示初譯本在翻譯過程中，筆受者可能會寫錯字，或者在筆錄時想不起來該字怎麼寫，因而創造出新的誤寫字形。在此案例中，該書寫者可能因無法確認該字的正確寫法，同時並列了他筆下兩個有疑問的用字。

又如第 14-15 行的譯文，可以合理推測在初譯本翻譯時，該名筆受或因語文能力有限，竟寫出了好幾個錯別字，但這些錯字在現存初譯本中都沒有被校對出來。仁宗朝校譯時，因其音、義與漢文底本不相合，故校譯者重新翻譯。但校譯者並未從相似字音、字形的選項中，推測出初譯時可能的正確譯文，而重新挑選了適合底本的語詞來翻譯。

校譯本調整了不少初譯本之文詞，有不小的比例可能與初譯本之譯文未貼近漢文底本有關。以經題為例，初譯本的譯者對《大方廣佛華嚴經》之漢文理解有問題，分詞斷句並不正確。這類問題有一部份在仁宗校譯本時獲得修正，但校譯本中也有尚未發現或新造成的錯誤。若從仁宗朝校譯本到了西夏國滅亡之後的元代依然持續印行此一事實來看，可以合理推測西夏仁宗朝之後可能沒有再次大規模校對佛經的作為。

現存黑水城出土的此種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初譯本，有將寫對的字和錯字同時並存於紙面的現象，最後不但沒有去掉錯字，甚至還將此種翻譯過程中的痕跡保留下來，顯示其校對不甚精良；或此本之謄寫抄錄者，並未仔細辨別這些編輯過程中應該刪除、修正的蕪雜資訊，反而將其一括抄入；或是謄寫了畢之後，亦無再次校對；或此版本是一種謄清的稿本，並非初譯本的定本。無論如何，既然仁宗朝時需要重新校譯這些經典，顯示惠宗等朝西夏佛典譯場的工作確實有需要修正的必要。如非初譯時譯場缺乏經驗，草率從事，就是有時間壓力，導致成果中充滿各式問題，日後需要再次修正。

⁴⁴ 除此之外，也有可能是校譯者對初譯本的譯法不滿意而有意修改之，並非初譯者誤聽、誤識。也不能完全排除筆錄時誤寫的可能。

⁴⁵ 也有「不是聽錯，而是筆誤」的可能。

西夏譯場是歷代佛典翻譯事業中相當特殊的案例，不僅留下了圖像與文獻，甚至保存了一部分西夏佛典之新舊譯本，讓我們得以分析西夏人翻譯河西大藏經之過程，及其修訂經文之成果。本文發現了一系列過去研究中尚未涉及的現象，有助於理解西夏語佛經新舊譯本的差異現象。作為西夏語文發展歷程之觀察入口，筆者今後亦將繼續分析此類文獻，以累積並深化對西夏人語言知能的認識。

參考文獻

(一) 佛教典籍

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2024.R2, T10, no. 279。

(二) 專書、論文

《𐰚𐰣𐰆𐰇𐰏𐰣𐰤𐰰》，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館藏，編號 CXIII|S|17|貴重。

《𐰚𐰣𐰆𐰇𐰏𐰣𐰤𐰰》，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藏黑水城文獻，編號 ИИВ.No.4271。

王作偉，〈歷代河西走廊譯史資料研究的現狀與展望〉，《語言與翻譯》2021年第2期，頁59。

史金波，〈《西夏譯經圖》解〉，《文獻》1979年第1期，頁215-229。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西田龍雄，《西夏文華嚴經》1，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1975年。

西田龍雄著，西田龍雄博士論集刊行委員會編，《西夏語研究新論》，京都：松香堂，2012年。

吳國聖，〈西夏文《華嚴經·十地品》「世間技藝」考〉，《2022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臺北：華嚴蓮社，2022年，頁195-207。

吳國聖，〈西夏文華嚴經中的「孝」：基於梵、藏、漢、西夏文本對勘之研究〉，《2018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臺北：華嚴蓮社，2019年，頁327-353。

李平艷，〈論隋唐時期譯場和佛經翻譯〉，《蘭州教育學院學報》，2019年第5期，頁162-163、168。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藏黑水城文獻》2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段岩、彭向前，〈《西夏譯場圖》人物分工考〉，《寧夏社會科學》2015年第4期，頁132-136。

孫伯君，〈西夏仁宗皇帝的校經實踐〉，《寧夏社會科學》2013年第4期，頁89-98。

- 孫穎新，《西夏文《大寶積經·無量壽如來會》對勘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
- 徐天池，〈論佛經翻譯的譯場〉，《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頁91-95。
- 崔紅芬，《西夏河西佛教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
- 曹仕邦，〈中國佛教的譯場組織與沙門的外學修——大乘佛教奠基於東亞的兩大要素〉，《中華佛學學報》第12期，1999年7月，頁113-131。
- 閔艷，〈佛經翻譯的譯場及翻譯程序〉，《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頁29-35。
- 陳永耘，〈一幅珍貴的版畫——《西夏譯經圖》〉，《東方博物》2010年第2期，頁111-113。
- 曾發茂、于光建，〈《西夏譯經圖》版畫的藝術特征分析〉，《美術大觀》2020年第1期，頁86-87。
- 韓小忙，《西夏文詞典（世俗文獻部分）》第7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
- 聶鴻音、張吉強，〈西夏佛經校譯所見的語音信息〉，《華西語文學刊》2016年第2期，頁154-157、403-404。
- 薩爾吉，〈試論《華嚴經》的構成與流布——以梵藏文獻為中心〉，《2013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臺北：華嚴蓮社，2014年，頁37-59。